

史記選

選 記 史

王伯祥選註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三 年 · 北 京

史 記 選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1 6 6 号)

字 数 411,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8

1957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1 月 北 京 第 5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470 定 价 1.33 元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司馬遷和他的名著史記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部劃時代的鴻篇鉅著。它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的體制和規模，被漢以後的某些封建史家稱爲史書的『極則』。在文學上，它的成就和影響也是很大的。對於這樣一部古代名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它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說明它是如何產生的，爲什麼會有那些成就和影響；今天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它的價值和作用；這是我們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的一項義不容辭的任務。

一

司馬遷，字子長，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他的生卒年代已不能確定，大約生於公元前一四五年（漢景帝中元五年）^①，卒於公元前九十年（漢武帝征和三年）左右。他一生的主要活動，基本上和漢武帝劉徹在位時期相終始。史記在那個時候寫成，不是偶然的。

^① 關於司馬遷生卒年代說法不一，我是採用王國維 太史公行年考，把他的生年算在公元前一四五年的。王說見觀堂集林卷十一。

漢代的封建統治政權，是篡奪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以後建立的。①在封建社會中，農民的起義、農民的戰爭，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雖然在封建的生產關係之下，農民的起義和反抗，並不能從經濟上根本擺脫封建的剝削，但由於農民起義的革命鬥爭，打擊了封建統治，因而總是多少推動了當時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正是經過了秦末農民起義戰爭，才出現舊史家稱爲「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②的所謂「文景之治」。到了公元前一四〇年漢武帝即位時，由秦朝開始建立的封建統一的中央集權統治，經過漢初六十餘年的經營，就已經初步地鞏固起來了。

封建史家班固會說，漢武帝時，「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就是說隨着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封建政權的鞏固，相應地包括觀念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築也必須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班固還說，因爲漢武帝的訪求和超拔，「羣士慕嚮，異人並出」，「漢之得人，於茲爲盛」；並列舉了包括司馬遷在內的有關哲學、文學、史學、藝術、天文、外交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③班固的話當然不免有誇張的成份，但我們不能否認，漢武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制度確立以後的第一個鼎盛時代，並且在學術文化上也出現了繁榮的局面。

歷史學，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它總是爲一定階級的政治鬥爭服務的。孔子修春秋，就是要「道名

①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可見司馬遷也承認，「亡秦」是以陳勝爲首的農民起義的力量。

② 班固：漢書刑法志。

③ 班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分』，『辨是非』，『懲惡勸善』，爲恢復『周禮』即奴隸主統治制度服務。戰國時的諸子，爲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往往也都從總結歷史的經驗着手，論證其理論的歷史根據。這就說明在當時社會大變動時期，不同的階級都要利用歷史作爲自己的鬥爭武器；而作爲新興的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們更把歷史經驗的總結當作自己的使命，以便能有效地戰勝舊的奴隸主貴族，爲封建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開闢道路。

封建制度確立以後，隨着階級鬥爭的發展和社會歷史的前進，地主階級對於歷史總要不斷地進行總結，這包括對以往已經被前人探討過的問題進行再評價和當時出現的新問題進行新概括兩個方面。秦漢之際出現的一批史書和一些政論性的文章，它們『連物比類』，以較爲翔實的歷史經驗論證對當時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爲鞏固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封建統治秩序服務的。

但是，從戰國以來的歷史著作，它們都存在着不少問題，從記載的範圍和時間來說，都只是記一國或數國某段時期的歷史，沒有一部囊括中外、貫通古今的通史；在內容方面都是局限於當時上層統治階級的『盟會』『征伐』，而沒有社會各階層代表人物的活動，更不用說有關經濟、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專門敘述；同時，當時的史書，由於過分強調所謂『道名分』、『寓褒貶』，而實際的社會歷史條件又限制了史家的視野，因而他們對於歷史事變的觀察和概括，就不免過於偏狹。史學本身的這些問題，到了司馬遷時代已經暴露得很突出了。司馬談就會說，自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到漢武帝元封元年，這三百七十多年當中，『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漢武帝時代，隨着統一的封建中央政權的

○史記太史公自序。以下凡引自太史公自序的，不一一注出。

建立和鞏固，編寫一部貫通古今上下，綜合百家之說的新史書，已經成爲歷史的需要。漢武帝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學術文化的繁榮，特別是對先秦舊籍的搜求和保藏^①，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使新史書的編寫有了可能。我們說史記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就是因爲它適應了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統治鞏固以後，按照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來解釋和整理古今歷史著作的需要，總結了『上記軒轅，下至於茲（指漢武帝時）』，包括將近三千年歷史的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通史。

這些就是史記產生的時代要求和歷史條件。否認或者忽視這個時代要求和歷史條件，把史記僅僅看作是由司馬遷的『偉大天才』、『家學淵源』才寫成的，顯然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司馬遷能够寫成史記，有他的主觀條件。他的祖先『世典周史』，父親司馬談也做過太史令，而且早就有編寫這部新史書的想法，他把這部史書的編寫當作上繼孔子修春秋的『大業』，下紹漢朝統治的『明世』來看待，臨死的時候還囑咐司馬遷，如果做了太史令，『無忘吾所欲論著』。司馬遷也說，他寫史記，是『悉論先人所次舊聞』，是『父子相續纂其業』。可見司馬談不僅有寫部史書的想法，而且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這至少爲以後司馬遷寫史記在材料上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

司馬遷十歲（公元前一三六年）那年，就開始學習『古文』，後來還跟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孔安

① 先秦的經籍，經過長期戰爭，散佚很多，特別是秦朝以及後來項羽的兩次集中燒毀，所存已不多了。漢惠帝發布廢除『挾書』的命令，但真正搜集佚書而且有一定規模成效，則是在漢武帝時代，所以漢書藝文志說：『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並受到較深的影響。①他還有相當廣博的天文曆算的知識，對於先秦和漢代的學術思想鬥爭的歷史，了解得更爲透徹。司馬遷在學術上這些較爲淵博的知識，無疑是他能夠寫作史記的重要條件。

公元前一二六年（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正好二十歲。就在這一年，他開始到祖國各地長途漫游。『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司馬遷這次漫游，踏遍了祖國東南美麗的山河，觀瞻了歷史傳說的遺跡，了解了社會的民情風俗，搜集了歷史的傳聞逸事。之後不久，他就入仕做了郎中。這是個『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整天跟在皇帝屁股後面轉的差事。職位雖不高，却相當寵幸。他『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②，對於當時最高統治集團的宮庭內幕，就有很多直接了解。公元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元鼎六年），他還『奉使西征巴蜀』，代表漢王朝去視察巡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使他能夠了解這些地區的山川形勢和民族風俗。司馬遷的漫游和官宦生活，不僅從實地的調查中進一步了解了許多歷史和現實的社會狀況，而且還親身體察了統治階級上層內部的各種鬥爭，這是他以後寫史記的直接材料來源。

在司馬遷死後的第三年，即公元前一〇八年（漢武帝元封三年），司馬遷繼承父職，也做了太史令。這時他就開始利用職務上的有利條件，『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着手史記寫作的準備。公元前一〇四

① 班固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是司馬遷受孔安國影響之證。而史記的『三統循環論』，則明顯是受董仲舒的影響。

② 司馬遷：報任安書。漢書司馬遷傳引。

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在主持了「太初曆」的改制以後，就正式開始史記的寫作。經過將近十年的辛勤勞動，終於在公元前九三年（漢武帝太始四年）^①前後，寫成了包括十二本紀、八書、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長達五十二萬餘言的鉅著史記。

二

在中國歷史上，史記一直被很多學者推崇備至。有人說它「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②有人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③這些評價，說明了史記爲什麼會被封建史家那麼推崇。他們所說的「法」、「凡例」、「極則」，就是指司馬遷採用紀傳體形式，爲整個封建史學開創了一套嶄新的歷史編纂方法。它主要是以歷史人物爲中心，將有關的歷史事件歸納、排比，記載到這一人物的傳中，從而由許多人物的傳記，構成一代的全史。司馬遷以後中國封建社會歷代「正統」史書，都絕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這套方法和體例。

史記主要包括「本紀」、「世家」和「列傳」三部分。這三部分的記述方法雖不盡相同，但都是以一個

① 報任安書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此時已基本寫成。據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報任安書是在公元前九三年十一月寫的，因此推知史記寫成亦當在此前後。

② 鄭樵：通志序。

③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

或幾個人物爲主的傳記。另外還有近似於年表的『十表』和專記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經濟水利等的『八書』。它們只是爲了補充紀傳的不足，在全書中是附錄性質的部分。①所以，唐代劉知幾抓住史記這個主要特點，把它和春秋相區別爲『紀傳』和『編年』二體。

從編年到紀傳，看來只是歷史編纂方法上的不同，但這種形式上的衍變，却反映了從殷周以來統治階級歷史觀上的變化。

中國的史學產生是很早的，還在奴隸社會，就有了史官。但在西周以前，所謂史官都是一種神職，專掌祭祀、占卜，和巫、筮、卜是一類的職務。②司馬遷敘述自己的世系時，說他祖先『世序天地』，他父親做了『太史公』，就只『掌天官，不治民』，他自己也是以『典天官』爲己任，『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發牢騷時還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可見史官這種傳統的職責，到漢代還部分保留着。此外，史官還負責文書起草，帝王巡遊、祭祀等大事的記載以及文書圖籍的保管。③實際上，當時所謂史官，就是統治階級中掌握文化的一部分人。這種將記人事與知天道的職責集中於一人的身上，反映了奴隸社會 奴隸主階級 『神意天命論』的歷史觀。

① 可以參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司馬遷自己的說明。

② 左傳閔公二年：『狄人囚史華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國語周語下載魯成公就『晉將有亂』問單襄公：『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答：『吾非晉史，焉知天道？』可見到春秋時，『掌祭祀』、『知天道』，還是史官的本職。

③ 參見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三至四頁。

在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由於人們對大自然的千變萬化無法了解，因而設想在自然界之外有一個「神」在支配着這一切。這種將自然力量人格化、神化，只是人們爲了解釋自然現象，而又由於「蒙昧時代的狹隘而愚昧的觀念」^①無法做到的一種意識反映。到了階級社會以後，統治階級就進而將這種有神論的意識系統化、凝固化，由「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現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爲歷史力量的代表者。」^②這種把自然力量神化，認爲社會歷史的前進和發展是由「神」決定的觀念，就是「神意天命論」的歷史觀。它是剝削階級愚弄、統治勞動人民的思想武器。在殷代，奴隸主階級就一直把「天命」看作是永恒不變的，因而代表天意的殷王朝統治也就是永恒不變的。所以，那時的史官被當作「替天行道」的神職，所謂「記言」「記事」，只是記下一些最高統治者代表天意所說之「言」和所行之「事」而已。

西周初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不斷提高，特別由於階級鬥爭的鐵的歷史教訓，就使不少人感到「天命靡常」，提出「敬德保民」，以守「天命」的口號。到了春秋，在激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變動中，更使一些人認識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③甚至進一步指出，統治階級「寵神其祖」，只是爲了「取威於民」^④簡直是揭了「神意天命論」的老底了。戰國以後，隨

①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〇頁。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三五五頁。

③ 這是晉國的史墨對「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的歷史現象的概括。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④ 這是楚國的觀射父回答楚昭王的話。見國語楚語下。

着封建制度在各個諸侯國的相繼確立，新舊的矛盾更加尖銳，階級鬥爭更加激烈。這反映在一些思想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中，就是更多地注意了人的因素，考慮了人的作用。秦漢之際，由於秦朝的封建統治政權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這個歷史事實，就更促使一些人去從社會歷史發展本身去進行總結，而把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放在社會治亂的主要位置去考慮。①

如果說，新興地主階級在同舊的奴隸主貴族的鬥爭中，需要一個新的歷史觀作為自己的精神武器，那麼，封建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出現和鞏固，就更為迫切地要求有一個新的歷史觀來鞏固和維護已經取得的勝利。還在戰國初期，一些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就會提出，天下應『定於一』。②但在很長一段時期，這種要求封建諸侯割據局面變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還只是一種政治理想。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才把這個理想變為現實，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的封建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漢代的封建統治，實際上是秦朝封建統治的繼續。經過差不多近一個世紀，到了漢武帝時期，這個統一的中央封建統治才真正鞏固起來。為了更好地鞏固這個統一的中央封建統治政權對廣大人民

① 例如賈誼的過秦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和賈山的至言（見漢書賈鄒枚路傳），這是兩篇總結秦朝滅亡歷史教訓的論文。他們都認為，秦的滅亡，根本原因不是失去『天道』而是失之於『人道』，『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蠶，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把『民危』、『民困』當作秦亡的主要原因，比起把歷史變動歸之於『神意』的安排，不能說不是歷史觀上的一大進步。

② 這是孟子對梁襄王提出『天下惡乎定』一問題的回答。見孟子梁惠王上。

的壓迫和剝削，封建地主階級亟需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來重新解釋歷史，這樣就在原來一些地主階級思想家對代表殷周奴隸主階級利益的『神意天命論』的歷史觀的批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適應統一的中央封建統治政權建立和鞏固以後地主階級所需要的歷史觀，這就是『帝王中心論』。司馬遷的史記，正是按照『帝王中心論』的歷史觀編寫的。太史公自序說：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爲什麼要寫史記呢？司馬遷自己講得很清楚：（一）爲了頌揚傳播漢代最高統治者的所謂『盛德』；（二）其次是宣揚那些『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三）最終是爲鞏固漢代大一統政權服務。『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寫史記，就是企圖從對具體歷史事變的探索中，來體現『帝王中心論』的歷史觀，爲漢代封建統治政權服務。

史記的編排體例，也很突出地體現了『帝王中心論』。司馬遷把歷代帝王列爲『本紀』，按時間順序記載每個帝王在位時的大事。所謂『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他是把王朝的更迭，帝王的嬗遞當作歷史發展的主要綫索的。所以，『本紀』實際是全書之綱。張守節說：『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紀者，理也，統理衆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紀』，是深得其旨的。

○ 這是司馬遷引證孔子的話，說明他爲什麼要寫史記的。見太史公自序。

○ 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除了帝王以外，是一些諸侯、勳臣的傳記，這就是『世家』。司馬遷說明他寫『世家』的用意說：『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一切都是以帝王爲中心，『世家』中所寫的人物對於『主上』，只不過如同衆星拱北斗，羣輻共車轂一樣『忠信行道』罷了。至於『列傳』，也是選擇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物，以顯『明聖盛德』的。一句話，帝王以外的人物，都是以帝王爲靈魂、爲依歸的。

司馬遷會說，春秋是『禮義之大宗』，『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是『天下之大過』。史記則是根據春秋的原則來寫的。春秋時代，孔子站在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立場，認爲當時的社會是『禮崩樂壞』，君不像君，臣不像臣，遑遑然不可終日，急的是如何『正名』，從而能『循名責實』，使君臣各安其位，維繫搖搖欲墜的奴隸制。司馬遷時代，地主階級已經在政治上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在他看來，當時的問題是君如何像君，臣如何像臣，以便進一步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史記就是根據春秋『道名分』的宗旨，把封建地主階級的等級制度和綱常倫理，以歷史總結的形式鞏固下來。它所寫的一百多個人物，就是按照這種倫理等級被層次地壘成一座封建寶塔，而在這座寶塔最高點的，則是歷代的帝王。

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同歷史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帝王中心論』把以封建帝王爲代表的少數剝削階級人物看成是天生的『英主』『聖賢』，認爲歷史完全是由他們創造的，這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並不否認某些剝削階級人物包括一些封建帝王曾在歷史上起過這樣或那樣的作用，

歷史學家可以而且也應該去寫他們，問題是如何寫。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①但幾千年來剝削階級的歷史學家，却把歷史當作少數帝王將相一類英雄人物創造的，而『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羣衆的活動。』^②這種唯心史觀始終只是爲剝削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辯護，爲鞏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統治服務。『帝王中心論』也正是這種唯心史觀。司馬遷從『帝王中心論』出發，吹捧、美化封建帝王和一些『功臣世家』，誇大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把封建帝王將相的興亡成敗、『文治武功』當作歷史。這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對歷史的根本歪曲。

『帝王中心論』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歷史觀的核心。這種唯心史觀是地主階級經過和奴隸主貴族的長期鬥爭，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以後，爲了更好地壓迫和剝削廣大勞動人民，鞏固封建的統治秩序而形成的。司馬遷開創紀傳體的記載形式，正是最適合於表現這種唯心史觀。了解這一點，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爲什麼中國封建史學雖有幾種形式，而唯獨紀傳體能夠成爲歷代封建統治者『欽定』『正史』的唯一形式。

三

司馬遷說，他的史記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著作。承認古今的歷史有『變』，比

①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一〇三一頁。

② 列寧：卡爾·馬克思。列寧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頁。

起『天命不改』的陳腐古老的歷史觀，當然是一大進步。但司馬遷所說的『變』，既不是承認歷史由社會內部矛盾的鬥爭推動向前發展的辯證法的『變』，也不是認為社會循着自然規律漸進式的庸俗進化論的『變』，而是主張歷史是按照一定時間為周期的循環往復的『變』，這就是貫穿史記中的『三統循環論』。

史記高祖本紀：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這段『太史公曰』，是司馬遷對漢為什麼能夠代秦的歷史原因的總結，因而也是最能反映司馬遷所謂『變』的實質：（一）古今社會就是按照『忠』——『敬』——『文』這套公式周而復始地『變』；（二）歷史無論怎麼變來變去，始終都不越出儒家的社會倫理範疇，它只有形式的不同，而沒有質的突變；（三）秦之所以那麼快就會被滅亡，是因為推行法家的一套『酷刑法』、『任力政』；（四）所以漢朝『承敝易變』，改行『王道』，『卒踐帝祚』，『得天統矣』。

既然『忠』『敬』『文』都是儒家社會倫理範疇，歷史何必這樣走馬燈式地變來變去呢？司馬遷說，這是因為『忠』『敬』『文』這些社會倫理範疇，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武器，是各有利弊，經過一段時間就對老百姓不管用了，因而必須交替為用。這個時間上的尺度，司馬遷也是有規定的。史記天官書：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歷史原來是這樣按照『小變』『中變』『大變』的尺度被剪裁，納入司馬遷規定的框框裏，而漢朝的統治政權恰恰是在歷史變完了『一紀』之後，進入第二紀的初始階段，那當然萬象更新，一切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理想的盛世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形而上學『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佔了統治的地位』。這種宇宙觀，不承認事物有變化，『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①司馬遷的『三統循環論』，正是屬於毛主席所批判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

『三統循環論』當然不是司馬遷的獨創，而是當時統治階級中一種佔支配地位的思想。^②所謂『三統』，是指以董仲舒為代表西漢儒家在『公羊三世說』的基礎上，並揉合了先秦陰陽五行學說而創立的一種歷史發展觀。它包括黑統、白統、赤統，認為歷史朝代就是依照這三統的次序往復演變着。得到哪一統而做了天子的，就要按照這一統的規定去『改正朔，易服色』。漢武帝時搞的封禪大典和太初改曆兩套把戲，就是這個理論的實際演習。而這兩件事，司馬遷都是親身參與，而且在史記中也是給予肯定的。^③

①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二八八頁。

② 上引高祖本紀中的一段文字，在禮記表記和說苑修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有人認為，忠、敬、文確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點，其實，這只不過是儒家的一種歷史觀。不過，由此也可以證明，『三統循環論』當時是統治階級中普遍流行的一種觀點。

③ 請參看天官書、封禪書及太史公自序等篇中有關論述。